

游海华 ◎著



师范大学历史学文库
传统社会与近代转型丛书

重构与整合

——1934～1937年赣南闽西社会重建研究



经济日报出版社

游海华 著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学文库
传统社会与近代转型丛书

重构与整合

——1934 ~ 1937年赣南闽西社会重建研究



江西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构与整合——1934~1937 年赣南闽西社会重建研究/游海华著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8.1

ISBN 978-7-80180-883-7

I. 重…

II. 游…

III. ①社会发展史—研究—江西省—1934~1937

②社会发展史—研究—福建省—1934~1937

IV. K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9812 号

书 名：重构与整合——1934~1937 年赣南闽西社会重建研究

著 者：游海华

责任编辑：陈昌文 松会敏

责任校对：孙景美

出版发行：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右安门内大街 65 号（邮编：100054）

电 话：010-63568136（编辑部） 010-88282292（邮购部）

网 址：www.edpbook.com.cn

E-mail：jjrbjb@163.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9.875

字 数：23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200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180-883-7

定 价：27.00 元

特别提示：版权所有·盗印必究·印装有误·负责调换

《江西传统社会与近代转型》总序

方志远

呈献给读者的是万振凡、陈晓鸣、游海华、谢宏维、李平亮五位青年学者的专题研究成果。这五部著作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以特定的“地域”为个案或中心，对清代至民国时期的江西社会特别是江西传统社会的近代转型问题进行了讨论。

这些年来，受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学术思潮的双重影响，中国历史学发生了极为深刻乃至带有革命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在学术理念、学术视野、研究方法、关注热点、思维方式及表述方式等各方面都表现出来。不管人们愿不愿意，中国的历史研究实际上已经进入多种学说并存、各种方法并用的时代，地方社会研究、区域经济研究及近代社会转型问题研究更形成了浩浩荡荡的学术潮流。五位作者多年在外地求学，感受风气之先，投身于这一学术潮流之中，可以说是真正“预流”了。^①

从作者的角度来说，这几部著作的选题显然都经过深思熟虑。九江在明代已经是全国七大钞关之一，也是江西唯一的长江口岸、唯一的近代开埠港口，风雨沧桑中记录着江西由传统走向近代艰辛而蹒跚的脚步。万载流民与土著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清初以来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乃至与台湾民众的暴动遥相呼应，这故事背后又有

①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采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

哪些故事？苏区研究是热点，但对后苏区时代这片土地上经济社会重建和复苏的研究却刚刚起步，这种反差可以理解，但这块禁区确实应该被打破。南昌是江西的省会，自然也是士绅“精英”集聚之地，他们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做了些什么，为何没能像上海、苏州、杭州、广州乃至长沙、昆明的士绅那样，尽快把江西推向近代化？江西是传统农业和手工业发达的省份，今天的“三农”问题仍然十分严峻，这种“传统”是如何向“近代”转型的、转型到了何种程度？其间的痛苦和曲折也该认真进行理性探讨。

不少学者在研究自己的“个案”时，总要声称这个个案如何与众不同、又如何具有典型意义。平心而论，我认为上面这些课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与众不同，也不具备“唯一性”。恰恰相反，它们却具有多发性。万振凡博士所讨论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前后”的江西乡村社会结构变化、游海华博士所讨论的红军撤离后前中央苏区经济社会重建与恢复，在同一时期全国各地的苏区、白区也同样存在。陈晓鸣博士所讨论的关于近代九江“中心”与“边缘”角色转换，至少在长江沿岸也不乏类似的例子。谢宏维博士讨论的流民与土著问题、李平亮博士讨论的士绅在地方社会的作用问题，不用说全国，即使在江西范围内，也不是个别的。但这丝毫不影响上述课题的意义和价值。其实，越是没有特殊性，越是不具备唯一性，课题的研究或许才越具有普遍意义，才越可能为其他的研究提供参照系。从绝对意义上说，“随机抽样”的代表性比“选择试点”要大得多。

创新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属性，但这种创新可以表现在多个方面。比如新资料的被发现或老资料的新解读，再比如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新发现、新突破。当然，也希望有新的理论或方法被引进或被运用。一个好的学术研究，当然希望有多处创新乃至突破性的发现，但所有历史研究的创新，又都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上，那就是用材料说话。史学研究可以有多个假设，也可以有多种方法或手段，但必须要有材料为基础，否则，假设永远是假设，方法和手

段也成“空手道”。

我并不企望这套书在所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只是希望每项研究与已有的相关成果相比，材料更加丰富一些，最好有新材料被挖掘，并在资料的考辨上多下功夫；只是希望它们的视野更开阔一些，对历史的理解更深一些，对现实的关怀更多一些，能够提出将研究推向深入的问题。或许是个人的偏见，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是在同一个模式或板块中符号或名称的变更，如“江南”换成“江西”、“四川盆地”换成“吉泰盆地”、“太湖流域”换成“鄱阳湖流域”，乃至“赣东北”换成“赣西北”，等等。我同样不希望这些研究是单个的、孤立的、无视国家权力存在的所谓地方社会研究，在中国大地上恐怕还找不到不受政府影响的“世外桃源”。如果其中有作者宣称：在赣江流域也发现了施坚雅的“六边形”、在江西地区也看到了黄宗智的“内卷化”和杜赞奇的“文化权力网络”；如果其中有作者宣称：我研究的这块地方就是这块地方自身的发展过程，就是纯粹的“这一个”，至于其他因素，非我所知。如果是这样，改一句流行歌词：“如果是这样，我真的很悲哀。”所幸的是，结果不是这样，作者们所进行的，都是具有一定创见性的资料详实的实证研究，作者们都是在充分关注国家权力与底层社会的关系中、在历史发展的动态进程中讨论自己的“个案”。

游海华《重构与整合——1934~1937年赣南闽西社会重建研究》涉及到的是一个早就应该讨论却还没有来得及深入讨论的问题，一个被重重迷雾笼罩的问题，即后苏区时代赣闽边区的重建问题。1929~1934年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战犹酣”，处于“围剿”与“反围剿”中心区的中央苏区，即赣闽边区，其人口、经济与社会遭受巨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但革命之后——不管是暂时的失败还是永久的胜利——老百姓还要居家过日子。1934年底，国共大规模战争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在重建赣闽边区地方政权的基础上，在社团组织恢复、难民救济、民众思想整合、社会关系调整、社会经济复苏及产权处置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确定

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至1937年春，边区社会重建与整合基本完成。尽管此过程中少不了并仍然伴随着阶级利益的争斗，但它促使社会经济呈恢复性成长，加快了边区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同时也为日后东南抗战夯实了基础，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持久抗战。该书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注重传统史学和社会史方法的运用，并采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民法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现代化转型和社会发展层面考察了1934~1937年间赣闽边区的社会重建与整合。可以相信，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梳理，总结良性社会发展所应具备的基本社会规律（则），对于促进当前公民理性认识和有序推进新世纪的中国社会改革，对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成功构建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的和谐社会，具有启示性意义。

晚清时期，由于地方军事化的需要及市场网络的重组，不少“新社会阶层”通过军功、捐纳等“异途”进入到士绅的行列，导致南昌士绅构成的多元化。清末科举制的废除、民初议会政治的出现，又使不少“耕读”士绅失去了传统的政治优势和社会地位，南昌的士绅阶层一度趋于分化与解体。但是，士绅们在外部世界的启示下，通过成立各种社团、创办新式学校和组建议会，广泛参与各种地方事务，在角逐地方权力的过程中实现了社会重组，对地方政局实现了全面控制。特别重要的是，在士绅阶层创办新学、推进地方自治、参与议会政治等“现代化”活动中，南昌的社会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并发生了转化，实现了传统与现代因素的有机结合。这是李平亮《卷入大变局——晚清至民国时期南昌的士绅与地方政治》给我们讲述的一段清末民初南昌地方社会的转型故事。作者将人们常说的“内因”与“外因”置于同一历史脉络之中，对社会转型时期的内在机制进行了颇有见地的分析，也试图在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两个层面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中揭示南昌的近代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士绅阶层既没有被“边缘化”，也没有急于依附“现代国家”而脱离地方社会，他们既积极参与各种现代政治事务，又仍然

热衷于传统社会活动，从而在自身的重塑中实现了对地方社会的全面控制，而宗族组织、神庙系统、慈善机构等地方文化也十分自然地融入现代国家之中。

与李平亮研究江西的中心城市不同，谢宏维将目光投向了赣西山区的万载县。在《和而不同——清代及民国时期江西万载县的移民、土著与国家》中，谢宏维向我们讲述了这个曾经令中央政府关注的蕞尔小县是如何在争斗不息中构建起相对安定的地方社会的。明末清初移民的大量进入，影响了万载县此后几百年间地方社会的变迁。在此期间，移民与土著、移民与国家、土著与国家、移民内部、土著内部、国家官员内部，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微妙纷呈、错综复杂，时时引发剧烈的矛盾与冲突。本书按照时间顺序，从地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脉络出发，把土、客矛盾所引发的一系列冲突事件纳入地方社会的发展脉络和权力关系中，以揭示在国家的影响下土客关系演变的机制与逻辑。作者致力于收集和利用地方文献，强调文献解读与实地调查的结合，强调“地点感”和“时间序列”的重要性，追寻和把握区域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通过一个个具体事件的研究，努力把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历时性研究与结构性分析、国家制度研究与基层社会研究真正地结合起来。通过细致地重构江西万载县 300 多年间跌宕起伏的土客冲突——国家应对的历史过程，作品向我们揭示了万载县土著和移民通过几百年的矛盾斗争悟出的一个道理：要和平共处、要安定和谐，就必须遵循从事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最基本的行事方式，必须遵循最基本的办事规矩。而这些本来最普通不过的规矩，在特定的情况下竟然需要通过反复的冲突并付出沉重的代价才能被接受。

九江特殊的位势，使其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带有明显的双重性。明清时期，九江在江西经济体系中处于边缘，但在长江流域却发挥着货物调剂中心的功能。近代开放以后，九江的角色随着全国市场和流通格局的变化发生了转换：在江南腹地的江西，九江从传统社会经济的边缘转为近代进出口贸易的中心；但在长江流域，九

江却由传统社会的货物调剂中心转为近代贸易体系的边缘。这种角色换位决定了九江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方向。陈晓鸣《中心与边缘——九江近代转型的双重变奏（1858~1938）》，选择从中心到边缘双重角色换位的角度对九江进行专题研究。全书综合运用历史学、城市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有关理论和方法，将九江与其所处的江西腹地和长江流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多方位的考察，深入探讨了九江社会的传统功能与近代角色的转换，论证了九江以内外贸易为纽带、与江西内腹地区以及长江贸易中心城市之间互补互动的双向关系，剖析了九江从中心到边缘的变换历程，并以九江城市为基点，从经济转型、城市发展、城市社会变迁等方面对九江近代社会的转型进行梳理，揭示了九江近代转型不完整性这一基本特征，进而探讨了九江在中国城市近代转型中所具有的类型学意义。

万振凡《弹性结构与传统乡村社会变迁——以1927~1937年江西农村革命与改良冲击为例》仔细分析了革命前后江西乡村社会结构，认为“弹性结构”是土地革命前江西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要害。作者从传统乡村社会结构要素的再生功能、结构系统的弹性空间和整体结构的弹性三个层面，对传统乡村社会弹性结构进行剖析，并根据弹性力学原理，构建了“传统乡村社会弹性结构”在外力作用下的运行模型。作者提出，传统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实质上是革命与改良这两种社会变迁基本动力的冲击与传统乡村社会弹性结构互动的过程。既然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弹性结构”，那么在革命、改良的冲击下，其变迁就有可能遵循类似于弹性物体的形变与反弹、变与不变等运行逻辑展开。作者描述了在革命和改良的冲击下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轨迹：在乡村革命的冲击下，乡村社会结构经历了一个由表层结构形变、深层结构内核保留到整体结构反弹的过程；在乡村改良措施的作用下，传统乡村社会“弹性结构”具有明显的“重建”容易、“复兴”却难的弹性特点。作者认为：出现这种结局的根本原因，在于乡村社会改造的对象存在着一个不易改变的“弹性结构”。这种结构就像一张巨型的弹性之网，

它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消减革命与改良的绩效。因此，传统乡村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就在于弹性结构的解构。

很高兴地看到，这几部书的作者们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历史学的优良传统，十分注重史料的收集和考辨，比较熟练地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分析，另一方面也对海外中国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给予了高度重视，试图运用其中的某些方法来解读文献、解释现象，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坦率地说，也留下了一些模仿的痕迹，说明这些理论和方法还没有完全融入自己的研究理念和体系之中。这十分正常，也完全可以理解。毕竟学习和实践需要一个过程。相对于其他作品，万振凡《弹性结构与传统乡村社会变迁——以 1927 ~ 1937 年江西农村革命与改良冲击为例》显得更“另类”一些。该书逐个分析了近年来海外中国学用以解读中国社会的种种“模式”，指出其贡献与不足，同时引入弹性力学的“弹性结构”概念，试图以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革命——改良冲击下的江西传统乡村社会变迁为例证，为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史提供一个本土化的分析模型。我赞赏作者的勇气，但也心存疑虑，不知这个“本土化”的模型是否经得起检测，它与 20 年前的“超稳定结构”有何不同？而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如果心中总是有着一个模式、装着一块样品，如果总是想追求对某种方法的运用、某种理论的实践，学术研究是无法达到“化境”的。这就需要加快“学习”和“消化”的过程。

其实，任何“科学”的方法都是相对的，任何研究模式都是有缺陷的。没有哪一种“科学方法”可以包治百病，也没有哪一个模式能真正“放之四海而皆准”。历史研究尤其如此。历史学应该同时具有描述和研究人类社会进程的两种功能，应该是多种学派并存、各种方法并用。人类社会发展的色彩纷呈要求历史学的丰富多彩。历史学在本质上是研究人、研究人的思维和人的活动的学科，是人文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差别，不仅仅在于可能复原与

不可能复原、可能重复与不可能重复的差别^①，更在于获取结论的方式和途径的差别，是内心的感悟和仪器的测试之间的差别。自然科学更依赖仪器测试，人文科学更讲究内心感悟。

历史研究当然也需要像自然科学的研究那样，尽可能地用准确的数据说明问题。但当暂时缺乏数据乃至无法获取数据时，也没有必要强求。严格地说，在历史研究中，数据是用来辅助文献记载、用来印证史家感悟，而不是用来决定研究结果。数字可以在具体的细节上修正感悟，但感悟却是整体真实的反映。如果历史学家通过考辨和分析史料得出的本来正确的感悟被貌似准确其实片面的数字修正得不正确了，才是真正的悲剧。当然，也有一些不很正确的感觉会被准确的数字修正或推翻，但这种感觉也一定有它产生的道理，或者说一定有数据所无法表现的历史真实。历史研究的结论应该是反映整体的真实，而未必斤斤计较于个别的真实。相反，无数个真实细节的拼凑，倒是可能破坏整体上的真实。

试举一例。《汉书·食货志》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表达的是整体上极端的贫富不均。如果通过所获得数据宣布：以某某富者为例，确实占有大片土地，有田地若干顷，但也

① 复原历史的努力已经产生出一批又一批具有价值的成果，但历史其实是不可能被复原的。西方学者深入到现存的一些原始部族中生活，试图以此来寻找远古时期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并取得了重要成果，但也早已陷于困境。因为他们可以说明现存的这一部族的现实情况，但不可能复原这一部族过去的情况，更无法断言这一部族的现实情况即是那些早已不再存在的部族过去情况。一些西方人类学家和中国学者深入乡村或山村进行考察，这对于搜寻当地居民乃至他们的先民的活动信息，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现在学者们所展示的“田野发现”显然都是经过“污染”的，即都是受现代生活影响的。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和村委会，有了电灯电话电视机，在这种状态下，今天的傣戏除了脸谱等可以“形似”之外，还有多少“原始”形态？今天的“客家”除了已经少有人住的“围屋”之外，还有多少过去客家的习惯？当然，我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是否定田野调查，恰恰相反，通过自己有限的田野调查，特别是同行学者大量的田野调查信息，已经给了我许多重要的启示。我的意思仅仅是，田野调查可以获得许多文献和实物资料，也可以获取诸多历史信息，但更多更实在的“感受”和“接近”，却是今天的现状。这也是许多朋友逐渐将目光由古代、由明清投入近代乃至当代的重要原因。

未必“田连仟伯”；同样通过统计宣称：以某某贫者为例，多少有一点土地，或者有一处陋室栖身，并未真的无“立锥之地”。这种研究结果固然达到了具体的、个案的真实，但在整体的真实性上则大打折扣、倒人胃口。

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差异决定了东方人和西方人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的不同，应该保留中国历史学和西方历史学差异的存在。借用谢宏维的书名，东西方之间在学术上应该“和”，应该相互借鉴、相互对话，应该尽可能地“与国际接轨”。但也不必事事都趋“同”。为什么就不可以保留“不同”？为什么必须弄得千人一面，把中国历史学的传统完全抛弃？再改用那句歌词：“如果是这样，我真的很悲哀。”如果这样，这个“轨”宁可不接也罢。事实上，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也不是千篇一律，杜赞奇可以建构“文化权力网络”，孔飞力却可以高声“叫魂”；何炳棣可以对明以来的人口统计进行质疑，黄仁宇则可以娓娓叙说万历十五年。

我一直认为，如果有宽松的研究环境、良好的研究条件、平和的研究心态，中国史研究的最好成果应该是由中国学者贡献。因为只有体内流淌着中国血液，才有可能真正用心去感受中国的事情、才可能有与生俱来的对中国问题的感悟。历史学家应该有“纵览天下”的视野，却不必也不可能承担起“包打天下”的责任。除去浮躁、卸下不该揽起的包袱，好的作品或者更容易出来。

江西师范大学“传统社会与江西现代化研究中心”成立以来，确立了江西民间文献与实物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明清江西移民与中国西南部地区的开发、江西近代社会转型三个重点研究方向，“江西传统社会与近代转型”丛书的出版，正是其中部分成果的展示。

前 言

毕业论文选题对大多数博士生来说，可能都一度成为“问题”，对我来说，自然也不例外。我曾就该“问题”征询过导师温锐先生的意见，他希望我的研究“点”定在江西省寻乌县。温老师的建议有多重考虑。众所周知，寻乌县以毛泽东 1930 年 5 月所作的《寻乌调查》而声名鹊起。据说，在当今的欧美学界，《寻乌调查》几乎是每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学生必读的入门书籍，就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的《大地》一样，它已经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然而直到今天，国内学界对于地处内地山区的寻乌，依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更遑论推出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温老师希望我的毕业论文能在当年毛泽东调查的基础上，推进对百年来寻乌社会的研究，以加深对近代中国的理解。这是温老师的第一重考虑。

第二重考虑是：大家知道，1929 ~ 1934 年，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底层民众在赣闽边区演练了制度创新的伟大尝试，直到今天，赣闽边区仍然是中外闻名的革命老区。长期以来，中央苏区一直是我国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阶级斗争、国共战争，以及根据地的建设等方面，研究视角相对狭窄。当然，阶级斗争是我们开展研究的很好视角，但是，仅有这个视角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从自然地理环境、地域社会矛盾、乡村权力网络、市场环境变迁、民间宗教与信仰等多个角度，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视野来认识问题。换句话说，应该是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推进，而绝非“只眼看世界”，以此将该地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三重考虑是希望通过对寻乌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对内地山区、传统中国和小农经济的认识。1996年进入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以后，得温老师的提携，我开始协助他从事其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规划课题的研究，该课题的结项成果后来以《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的书名出版。实际上，该书就是以前述新视野研究赣闽粤边区的一个尝试。温老师希望我在我们已有宏观研究的基础上，再以寻乌为研究地域，推出一项中观或微观层次的研究，以进一步深化我们的研究与认识。

尽管温老师有上述多重考虑，并对我的寻乌研究寄予厚望，惭愧的是，我最终却辜负了他的期望。原因不是我对寻乌不感兴趣（其实恰恰相反），而是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研究切入点。尽管此前的几年，我随温老师有过多次下寻乌实地调查的经历，也看过多遍《寻乌调查》和同光时期的寻乌地方志，但是，在现有的文献中，我无法找到研究寻乌的主题和切入口；在超赶论文和如期毕业的压力下，我也无心再下寻乌找资料、看档案、做调查，去慢慢花时间琢磨。我的“寻乌梦”不得不就此打住，将来或许还有机会吧！

正在我游离、彷徨之际，我想起了1998年前后的一些往事。那时，我正好研二，为完成课题和毕业论文，我在江西省图书馆查阅了约1年之久的民国地方报刊（十年前的省图特藏部阅览室，不如今天这么“热闹”，每天几乎都是我一个读者，形单影吊，好在书中自有天地，有时候还可自由出入书库）。其中翻阅的30年代前中期的《江西民国日报》（复印版，1929~1949年大部分保存完好，我一张一张地翻阅，需要的资料，则用卡片一一摘录），里面有大量关于国共争战和战后江西社会重建的资料，当时看到那些标题、报道，觉得新鲜、有趣，觉得有“东西”可做，但是当时刚入史学研究之门，对于这“东西”到底是什么，我却又不很清楚，再说当时任务在身，也无暇细顾，然而这些材料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随着我们对赣闽粤边区研究的深入，资料中所反映或涉及到的一些问题，常常引起我的思考。例如土地租佃制度。20世纪40年代，无论是赣南“地归原主”的地区，还是闽西苏区革命成果保存的地区，据章振乾^①1945年的实地调查，出现了土地租佃普遍恢复的趋势。这种土地租佃的现象在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来的农村，可以普遍看到。我们曾经将土地租佃现象作为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特产或主要罪恶，既然如此，在苏区成果保持地区，尤其是在地主土地所有制被消灭多年后的今天，为什么农村还普遍出现土地“租佃”现象？

再如，长期以来，学界都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近代中国，占人口10%~20%的地富阶层占有中国80%甚至90%的土地，而占人口90%~80%的农民却只占有20%到10%的土地。赣闽边区的实际情况是，宗族、寺庙以及民间会社占有大量的土地，大概在30%~40%之间，与学界传统判断大相径庭。同时，正因为民间组织占有大量土地，这使得它们在修桥补路、兴学办学、周济贫困等方面能频频作为，这对当地农民走入近代市场、适应市场经济竞争，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等都有着重要的作用。问题是，在我们称之为“积贫积弱”、“封建落后”的近代赣闽边区，还能有一些农民自己的救济组织，并能提供一定的公共产品，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为什么赣闽边区大部分地区、大部分农民反而没有什么社会保障（农民的医疗保障、免费义务教育最近一两年才试点推行）呢？

还有，传统的研究将近代中国农民的破产和失业，归结为封建剥削和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的贫困与农村的落后虽有所改善，但农民的弱势地位依然如故，新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似乎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严峻。甚至在改革开放

^① 章振乾先生当时是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改革开放以后，曾出任全国政协委员、民盟福建省委员会主委、福建省政协常委；大约2005年春去世。

20多年后的今天，全国“无职业、经济无来源、生活无保障”的失业农民超过4000万。^①以此看来，农民破产和失业并不是“封建剥削和帝国主义侵略”的特产。另外，人所共知，1937年全民族抗战以后，赣闽边区是东南抗战的中心，为中国的持久抗战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在几年前暨30年代初，她还处在大规模的国共争战之中，作为战区的赣闽边区，其经济、人口与社会均遭受巨创。那么，赣闽边区是怎样从遭受战争破坏的状态中走出来，并逐渐成长为东南抗战大后方的呢？

对于以上问题，学界传统的研究并没有给予充分而有力的解答，并且许多问题和解答往往都绞在一起，相互矛盾，难以令人信服。我就是在温锐老师的引导下，带着这些问题逐步进入赣闽边区研究的。与此同时，面对着传统中国周期性的动乱，尤其是近代中国持续的社会动荡和百年来中国人多条救国道路的探索，我也常常思考，是否存在确保人类社会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的基本规则（制度），如果有，它们到底是什么？又隐藏在何方？要探讨诸如此类的问题，1934~1937年赣闽边区的社会重建与整合，可能不失为一个绝好的研究个案。十年前浏览的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江西民国日报》的系列资料为我提供了研究的主题和切入口。

这一课题还有两个“东西”激起了我的兴趣。一是传统的党史和革命史研究，其重点在中央苏区（1929~1934），对于此后至抗日战争前的赣闽边区，其兴奋点也集中在“三年游击战争”，对于战后该地的社会重建，国内学界并无系统研究。后来，温老师从台湾带回来的信息，和我自己与台湾学者的接触，都证实了相同的结果。这意味着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可能填补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某些研究空白。二是1934~1937年赣南闽西社会的重建与整合，是战乱后和平秩序的重建与稳定，是封闭山区重新融入近代世界市场和

① 这是2004年全国政协001号提案里面的资料，是九三学社的一份调查结果，见《001号政协提案呼吁关注失地农民生活》，《广州日报》2004年3月5日。

现代化的进程。而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是经过长时期的体制改革探索之后，又处在重新确定社会发展方向和构建和谐社会这样一个良性社会发展模式的改革攻坚关头。20 世纪的国共两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实际上都面临着现代化发展和重新建构一个社会发展的任务。在同一现代化背景下，1934 ~ 1937 年的社会重建与整合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有没有借鉴意义？有哪些借鉴意义？我想，如果能把这些问题理清楚的话，将不无意义。

最终我将论文选题锁定为“赣闽边区的社会重构与整合”，非常感激的是，我的研究计划得到温老师一如既往的支持。今天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就是我博士研读期间的一份答卷。所谓“丑媳妇总要见公婆”，希望读者和学界给予批评指正。

游海华

2008 年春

于江西师范大学东区旧宅